

孙犁先生归来

浩渺



这两天,我的心情急迫着,急迫地等待“孙犁先生”从湖南长沙“归来”。这里的“孙犁先生”,是指孙犁先生的一尊造像。我在急迫地等待着。等待中,想起了旧事。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保定师范(旧称“二师”)读书时开始喜欢孙犁先生的作品的。当年,高中学生孙树勋正在与“二师”斜对过的育德中学读书。不久,他的作品出现在了育德校刊上,孙树勋便是之后的作家孙犁。我坐在“二师”寂静的图书馆里,读着《荷花淀》《铁木前传》和《风云初记》,复原着他在这一区域的时代影像。刚刚出版的《晚华集》《秀露集》等,我迫不及待地买来品读。这些小小开本的图书和里边的文字,读下去,孙犁先生的青年形象和与保定的关联渐自丰满并贮满了内蕴。

1987年6月,我奉调满城县文联。不到一个月,我便联系了两名同窗文友前往天津拜访孙犁同志。由于有时任保定市委文联主席韩映山老师的介绍,我们一大早就找到了多伦道先生的寓所并畅快地得到允入。那天孙犁先生精神不错,穿着肥大的旧衣裤,就像一位刚刚从田间归来的邻居大伯。我向先生谈到保定并散谈求学于“二师”,他散漫的目光一聚,之后又散淡开来。但我知道他的心境已然不一样了,那是往事的齐聚和情感的迸发。我又说,我的第一篇小说《新峪》是发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与您和顾工老师同版呢。这次他又聚拢了目光,向我这里看了一下。我还向他请教了欧风东渐和意识流的问题,其实他的这类观点文章,时常会在《人民日报》副刊上读到……会谈莫超10分钟,但那次显然已超过半个钟头。虽然先生的兴致和劲头未减,但我们还是选择了告辞。这次会面,对于一个基层作者来说,它的潜在作用无疑是长期的、巨大的。2002年7月,孙犁先生辞世。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之后又去寻他安葬的老家,现在叫“孙犁故里”。我在留言簿上写下了“敬拜孙犁”,以表我对孙犁先生的崇敬之情。又有村里的老支书聊了一个中午,归来写了《与孙犁相关》,发在《保定日报》。

我有一个曾在满城教书的朋友,善雕塑。我想请他为我塑一尊孙犁先生的石膏像,他爽快答应了。大约是2007年下半年的某一天,我去古旧市场选淘旧物。临近中午,忽然想起那位朋友好像离此地不远。电话一通朋友就热情地邀我过去,七扭八拐才找到了他的工房。我看到了他手工捏塑的孙犁先生像,个头不小,但我总觉得离我心目中孙犁先生的形象还差那么一丁点儿。他说这还差几道工序呢,到时保你满意。临别也忘了说些什么话或承诺,我的心满怀期待。后来不多长时间,我见到了我的一个学生,他曾在位雕塑朋友那里打工。学生说我离开那里后,雕塑工坊就不干了。我也没再和这位高雕塑的朋友联系。那尊雕像的情形也就不得而知。

这条路没有行通,我便开始收集孙犁先生各种版本的图书。先是散本的《老荒集》《尺泽集》《陋巷集》《曲终集》《芸斋小说》等,后是《孙犁文集》。大约是1983年,我在给《文艺增刊》投稿时联系到了邹明老师,他回信时附言《孙犁文集》即出,并告之了定价。后来听说又出过带孙犁先生宣纸保真印章的文集,是效法鲁迅先生纪念文集的手法。现在仍会把这些旧书籍攒作一处,不时翻看,仿佛回到了自己的青年读书时光。我还想收藏一份孙犁先生的信札。但当我真正面对的时候,我就想了,这是一套完整的书信文化体系,环环相扣,而且信件大都已成书出版。我选择了一封信原大的复印件,还有一册信札出版前的校印稿,已经很满足了。

但这些似乎还是不能满足我对孙犁先生及其作品的喜爱之情。我知道我的内心,还是想着拥有一尊孙犁先生造像,置于案几,早也看得晚也看得,也是我深深的敬意了。去年在一篇微文上,我看到了一个信息,2013年孙犁先生诞辰百年之际,河北大学监制出了少量的孙犁先生瓷像,原稿设计是天津艺人张、曲阳县一家定瓷厂烧制。我打通了这家瓷厂负责人的电话,表述了我的意愿。对方说确实是做过一批,但厂家已无成品。他透露给了我一线希望是,看是否还有原模,如有的话还可为我搭烧一件。过了一周再联系,说原模没有了!他建议我联系一下河北大学,也许哪间库房还会有惊喜。

我赶紧联系了稍熟的几位河大的朋友,但他们大多不知道此事。我忽然想起微文中谈到过一位,他可能是那次活动的直接经办人。又是一番找寻,得知那位老师已调往浙江杭州。我的心潮又鼓胀起来。那位调往杭州的老师说,他调出多年,余下的事情已不知晓,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多半,但还是热情地告知对方,或有信息,请及时通知我,另加了3个笑脸。我知道这是我在安慰和鼓励自己。

我只好漫无边际地继续在网上寻找信息。忽然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版本的孙犁先生造像,古铜色,尺寸比白瓷像略小。仔细一看,这竟和河北大学监制的白瓷像是一个版本!我的心情激动起来,一看售价有点小高,只好暂时按下心情,耐心等待。隔三岔五还会看看造像是否还在,看看货主是否修改了价格。如是约有半年。其间我又找到了一位搞泥塑仅见过一面的朋友,他是在这个界别的知名人物。但他不支持我做泥塑,说可翻模做铜或白玉的造像。我问可否手做一件泥塑,符合孙犁先生的为人品格,还有他作品质朴中带着泥土气息的特质。这位朋友说,如此烧成率极低,还易变形。

我找到了网上挂着的古铜色孙犁造像店主的电话,他是湖南长沙一家书社的老板。我向他倾诉了对孙犁先生像的喜爱和与孙犁先生曾有过的一面之缘,表示想适当谈谈价格。这位店主听后热情爽快地答应了我,并称这是一桩因孙犁先生而生的缘分。他说他也喜欢孙犁先生的作品,能够知晓我现在的心情。半个小时后,他告知我,孙犁先生造像已签单完毕,准备路上返回冀中、返回保定的行程!我激动起来,开始急迫地等待着。

人们喜欢孙犁先生和他的作品,大抵是因为他仁厚的为人,还有作品字里行间浸润出来的乐观、向上和独特的审美意趣。先生已“归来”,无论是在急迫等待的路上,还是徜徉在历史的星空,或是久住人们的心田……

父亲年轻时当过兵,先后转战湖南、湖北、黑龙江、新疆等地,修过铁路,架过电缆,采过石油。上世纪80年代末,父亲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转业回到了老家湖南,把退伍时穿的那身绿军装锁进了箱底,从此视作珍宝。

我那时正读小学。有一次,放学回到家,突然发现父亲军装的箱子忘了锁。我从小就对军人充满了崇拜,渴望长大以后,也能当上一名光荣的解放军。于是,怀着对军装的敬意,我从箱底翻出了父亲的军装,穿在身上当成戏服似的“唱、念、做、打”起来。正当我在院子里玩儿得开心的时候,冷不防耳朵被人拧得生疼,转身一看,原来是父亲。慈祥的父亲并没有打我,而是和蔼地对我说:“这是我当兵四年唯一的念想了,得保护我们的眼睛一样爱护它。”从那以后,父亲对那身军装更是严加看管,每年只在“八一”建军节那天,才偶尔翻出来穿一下。

后来,我上了高中,那年在准备毕业晚会时,班上同学精心编排了一个话剧,展望我们走上社会后,可能会从事的职业,要求穿不同的职业装。我选了一个当军人的角色,由于服装要自己准备,加之我一直忙于学习,没有时间去落实军装的事,临到表演那天,我才突然想起向父亲借军装。原以为父亲会一口回绝,想不到父亲问明情况后,很爽快地答应了。他打开箱子,从里面小

永不褪色的戎装情

刘小兵



心翼翼地捧出那身绿军装,交给了我。虽然父亲退伍已十年,可这身军装在他的精心保护下,依然纤尘不染,整洁如新。那晚,我穿着这身军装,举着鲜艳的军旗,像个军人一样地迈着矫健的步伐,行进在舞台上,一时间,博得了满堂喝彩。回到家里,父亲高兴地夸赞我演得好,我一愣,问父亲:“您听谁说的?”父亲呵呵一笑:“我在台下看到的呀。”原来,出于对军旅生涯的留恋,那晚,父亲也偷偷跑到学校礼堂,观看了我的表演。我知道,不是我的表演多么到位,而是父亲的这身军装,由于带着岁月的沉淀,带着一个军人朴素的情感,所以,无形中给了我力量,是父亲平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感染了我,才让我在舞台上有了逼真的表演。

之后不久,在高考中我因过于紧张,落榜了。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去当兵。父亲听了,又一次从箱底翻出那身绿军装,郑重地告诉我,不管是步入大学学堂,还是走进绿色军营,都要抵御住各种各样的诱惑,要像这身绿军装一样,时刻保持朴素的本质。如此,才能让自己的思想做到纤尘不染,使自己的灵魂纯净清澈。说完,父亲让我穿上军装,一家人走进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算是对我当兵的支持。不久,我如愿以偿地走进了火热的军营,每当在训练、执勤中遇到困难时,我都会拿出那张全家福,认真地端详,看着照片中的绿军装,会不由想起父亲亲切的告诫之语,浑身又充满了力量……

四年后,我退伍到了地方,是离父亲很远的城市。临行前,我穿着一身便服去看父亲,父亲笑着说:“不如你我都穿军装,一家人再照一张合影吧。”在父亲的提议下,我穿着橄榄色的作战服,父亲穿上了那件依然整洁如新的绿军装,再次照了一张全家福。

如今,两张全家福都被父亲精心地装裱挂在了客厅最醒目的位子,它成了一家人最好的念想。是永不褪色的戎装情激励着父子两代人献身国防,也让这段当兵的历史,成了一家人心目中最美的荣耀!

满庭芳

第五一七〇期

老兵的敬礼

张金刚



下这片城南庄的土地,还是他可亲可敬的“聂司令员”,还是那个敬礼,那声报告,可就是这短短十几秒的敬礼、报告,整整跨越了68年。

聂司令员还是当年在城南庄时四十多岁的模样,智俊信依稀还是那个少年,年少俊朗的面庞对着司令员:“报告,今天的《晋察冀日报》、机要文件和书信送到!”虽然聂司令员再也不会亲切地喊他一声“小鬼”,可智俊信依然庄重敬礼,响亮报告,他坚信,司令员就在跟前,他能听到,肯定能。

听着姥爷讲的故事长大,又到纪念馆工作的白雪,懂姥爷的心与情,激动地掏出手机,拍下了姥爷伟岸、坚毅、忠诚的背影。这照片拍了一次,我便烙印在脑海。当照片中的老人即将与我面对面时,我竟有些惶恐。我敬重深居简市、归于平凡的战斗英雄,敬重等待我的、徐徐展开的革命故事。那位端坐沙发、埋首翻阅书本的老人,便是我崇拜了六年的智俊信老人。

当年谁能想到,一个穷山沟里的穷小子,能成为聂司令员身边服务多年的“小鬼”。这缘分,就于1941年聂荣臻“三进三出常家渠”。

常家渠,这个阜平窝镇曾名不见经传的深山小村,因聂荣臻率万人军队驻扎于此,与日寇斗智斗勇、突出重围的传奇故事,而名扬天下。在兵荒马乱与战火硝烟中长大的智俊信,曾跟粮主任粮贾主任的大哥往常家渠送过公粮。这公粮是当地百姓交租后仅剩的口粮,是老百姓与子弟兵感动天地的鱼水深情。

大哥常讲:“短下什么,也不能短下公粮。”十二岁的智俊信并不太懂这大道理,但他对共产党、对子弟兵、对聂司令员有着深深的崇拜、景仰与笃定。受家族4个党员哥哥姐姐的影响,智俊信光荣地于1945年7月秘密入党。那年,他16岁。1946年10月参军入伍,光荣地成为华北军区三分队一名战士。那年,他17岁。

曾有小学生问:“您为什么那么小就要当

兵?”智爷爷坚定地说:“你不当兵,我也不当兵,那谁来当兵保卫国家?我虽然只有17岁,但我有参军报国的决心,有众多和我有一样理想信念的兄弟姐妹。大家团结起来,一定能取得胜利!”

这信念支撑、激励着智俊信在战斗的道路上,走得英勇,走得无畏。曾参加过解放战争中著名的清风店战役、正太战役及解放石家庄、解放天津、解放太原、解放北平、进军大西北等重大战役。这些战役惊心动魄,可姥爷讲起来却云淡风轻:“那都是日常!”

自1947年1月智俊信被调至晋察冀司令部通讯队后,便荣幸地成为聂司令员身边的通讯战士,从阜平老家到张家口,再到城南庄、西柏坡,最后到北平。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抗美援朝。作为从老家阜平走出来的党员,作为聂司令员身边可靠的战士,1952年5月,智俊信在华北军区报名顺利获批,编入志愿军六十八军,抗美援朝一年零两个月。

远没有上甘岭、天津湖、金剛川等战役著名,无云山战役,因此刻坐在我身边的智俊信老人曾参加过,我也初次听闻,便开始在脑海里全新刻录。冲锋前,副指导员智俊信对全连156名战士说:“打死一个,够本儿;多打死一个,咱就赚了。死了,咱就是英雄!”最后活下来的也是英雄,可只剩25人。战役之残酷、之激烈,智俊信在讲到无云山高地时用的两句话令我动容。一句是“阵地被打‘翻’了”,一句是“随便伸手一抓,全是弹壳”。我能想象得到,但又全然体会不到,那可是眼前这位如此平和的老人亲身经历、亲眼所见呀!我全然想象不到,但又能体会得到,面对凶残的敌人,眼前这位老人的“慈眉善目”也曾无数次“横眉竖目”,迸射出刚毅的火焰!

硝烟散尽,岁月流转,一切皆成过往,英雄归于平凡。1953年7月,从战场上下来,智俊信被派往华北军区太原第二速成中学学习。前途本不可限量,却因家中母亲、弟弟有病需要照顾,于1955年4月、29岁转业地方,任罗家湾乡乡长。1958年,智俊信被调至县农业局农机公司工作,直至1990年1月离休。地方工作35年,智俊信淡忘了自己的功勋,却始终铭记自己是名共产党员,始终铭记“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哪里最艰苦,我就到哪里安家”,无论干什么,“都是一心一意,干一行爱一行,哪一行我都不是外行”。

聪明好学的智俊信,从岳父手上学得一套正骨手法。县城及周边谁不慎错骨、扭伤,都会上门求助正骨,智俊信都爽快答应。“揉好,你走你的,不要钱。谁要给钱,马上退回”。有人说:“你私下帮人正骨近四十年,少说得有几千人次,每回收十块钱,也不老少呢!”智俊信严肃地说:“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我有工资,有离休金,咱可不能钻钱眼里。”2008年汶川地震,智俊信捐了1000元特殊党费。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智俊信又捐出一万元。

这便是共产党员的本色,是我永远敬重的英雄。时光荏苒,老了的是容颜,不老的是对党的情怀与信仰。眼前93岁、77年党龄的智俊信老人,目光澄澈,初心不改,“虽老犹未老也”。

虽然我并不是军人,但我是共产党员,等再去纪念馆,我也要向聂荣臻铜像敬个礼,向聂帅报告:阜平已富,像智俊信这样从战场上下来、参与过国家建设、隐姓埋名的英雄,生活得很好;像我们这样生在新时代、奋斗在新时代的年轻一代,生活得正好;像街上奔跑的那些新生代及将来的“后来人们”,定会生活得更好。我坚信不已。

转椅摇椅的快乐新天地

姜维群



洁上丛话

海派家具进入20世纪,颠覆了中国“坐如钟,站如松”的传统家具观,讲求坐起的舒适性、随意性。海派座椅出现了转椅、摇椅等新品类,座椅上的快乐新天地出现了。

传统座椅是规规矩矩的,没有任何的可调节性。转椅解决了椅子高度、角度不可调节的问题,这样的转椅曾得到乾隆皇帝的关注。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特使马嘎尔尼进献贡品19宗,都是新奇贵重之器,其中第八件是“奇巧椅子一对,使人坐在上面能随意转动”。1904年美国圣路易万国博览会上,大清国的“旋转椅”已经出现了。不用说,时尚前沿

的大上海海派转椅已“合璧”成功了。

角度随意调节,高度瞬间升降,这是椅子类坐具的一大革新。旋转椅是铸铁工业进入木器的一个标志,是机械加工已与木器制作后的一个飞跃。此时的海派家具已经有了转椅和安装滚轮可以随意移动的餐桌餐椅了。

转椅的发明是工业进步的产物,它是将椅座与椅腿分离,用一根粗的螺旋钢(铁)柱连接,使之能够原地旋转,同时用螺旋杆升降调整椅座的高度。转椅在民国时期风行一时,主要用于办公室,而且是一种高级别的坐具,一般职员和工作人员是不会配置转椅的。另外,一些富豪之家在书房也配置转椅,如梁启超在天津的饮冰室中就使用皮转椅。

摇椅,在中国家具中称“逍遥椅”,西方称之为“安乐椅”。在西欧,扶手上软垫配置,法国称之为“贝尔热尔式椅”,英文中亦被称作“安乐椅”,现在古旧家具市场中称作“安乐椅”的就是摇椅。

摇椅分为坐式、半躺式和躺式三类,都是根据圆的重心原理设计制作的,是将椅子的腿变成弧形的圆木,使人坐上能随着重心的转移而前后摇动。

海派家具的摇椅来自欧式家具。19世纪的奥地利家具师迈克尔·托耐特的曲木家具为现代家具开辟了一个新途径,其制作的洛可可曲线的曲木摇椅受到追捧并在美国很快流行,海派摇椅有的就吸纳了曲木家具的思路。

原开滦矿务局大楼：煤炭工业沧桑写照

罗丹



提起开滦,天津人并不陌生。一是因为这家企业总部驻天津近百年之久,它原先的办公大楼现在仍然矗立在和平区核心区域,是泰安道历史文化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开滦生产的各式工程砖,曾广泛应用于天津的楼房建造和地面铺设。最为人们知的“大象砖”,选材精良,结实耐用。缸砖一面雕刻有亚洲象造型,取吉祥之意。下方的英文“KMA”是开滦矿务总局的英文名称缩写。开滦砖品款式丰富,行销各地,是多种经营项目中的主打产品。

对煤炭的大规模开采和利用,是近代工业化发展的必然需求。鸦片战争以后,各个通商口岸包括货轮运输、公共基建等新型产业都要依赖大量煤炭维持运转。另一方面,洋务运动诞生的军工和民企的生产制造规模不断扩大,使土煤不敷所需,而长期采买洋煤,也绝非长久之计。1876年,李鸿章委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在直隶开平勘探煤铁矿藏,至1878年开平矿务总局成立。作为官督商办形式,它是中国第一批引进西方技术使用机器开采的大型煤矿企业,在唐廷枢悉心经营下,数年间不仅为各方用煤提供保障,并与轮船招商局配合,在各大经销城市对洋煤进行有效排挤。此外,开平还积极发展多种副业,如垦殖、金银矿、运河、货运码头、唐山细棉土厂(中国最早的水泥厂,即后来的启新洋灰公司)等。最为人们熟知的是唐胥铁路。这条从唐山到胥各庄的运煤铁路,于1881年建成,是中国自建的第一条标准轨铁路,被公认为中国铁路建设的开端。

1900年庚子事变,开平矿局时任督办张翼遭受欺瞒,矿权丧失,开平矿局转而成为在英国注册的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史称“开平矿案”。近代著名实业家周学熙向袁世凯建议再办煤矿,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成立,针对性地开展开平附近各矿的煤层,使开平矿无法向外延伸,意图抵制和收回开平煤矿。“开平”“滦州”后在价格拉锯战中两败俱伤,1912年双方签订合同,联合组设开滦矿务总局,总部仍设天津。合并后的开滦,继承了两家企业的优质资源,摒弃了“官督商办”在融资与人事方面的弊端,逐渐形成完善的组织系统和运营机制,在资本额和产煤量上长年远高于其他矿企,引领了近代工业潮流。

原开滦矿务局大楼由英商同和工程司美籍工程师爱迪克生和达拉设计,建于1919年至1921年。建筑为三层混合结构带地下室,坐南朝北,占地为矩形。泰安道一侧的立面,中间部分内凹,采用贯通两层的14根高大爱奥尼克柱式整齐排列。柱廊间隙有深色方窗,窗楣墙为方形凹凸造型。上方连接通长的挑檐,檐壁有一定的宽度。通过表面陈旧的痕迹,推断原有开滦矿务局的英文名称铭牌镶嵌于此。挑檐之上的三层设方形扶壁柱,与下方圆柱一一对应。顶部檐口多层次线脚形成立体腰线,上方的女儿墙由建筑边缘向中心阶段式提高,强调入口引导性。入口处设三座棕色大门,门楣有涡卷装饰,而中间门的门楣涡卷夹花苞形雕饰,显细节。门前高台阶和坡道形成高出地面的宽阔平台,古典式大型花盆分布四角。

入口内的门厅为井字梁式顶棚,通过大理石台阶后,同样有三座玻璃门与主厅相连。主厅贯通三层,顶部是镶嵌彩色玻璃的半圆形采光屋顶,拱券上有精美雕饰。主厅为圆柱,柱头由与柱身颜色相近的紫铜板制成。围绕大厅有宽敞回廊,地面由彩色马赛克砖铺装,周围是大理石墙裙。分合式主楼梯在大厅东侧正中,二层楼梯口对应位置的栏板上安装有一座西洋古典钟表。二层回廊所用栏板为汉白玉米字方格镂空式,地面铺木地板,顶部为拱形。

各层房间沿回廊进行布置,一层有产品展示室、会客室、会议室,二、三层为办公室。多数房间门为高级硬木镶板门,上方有木质山花。主房间内装用硬木护墙板、窗台板,并设古典壁炉。木质暖气罩镶有黄铜材质鱼鳞图案装饰,顶部的拱形石膏线同样雕刻花饰,中心有古典吊灯垂落。独具特色的产品展示室,全屋由开滦品牌的各类产品进行装饰,拱券式弧形门洞贴以驼色麻面砖,门梁上的两坡顶覆盖红色牛舌瓦。墙面和地面整体分隔为不同区域,分别辅助各类面砖和水泥花砖、缸砖等地砖。这间五彩斑斓、产品荟萃的展室,曾作为电影《开罗宣言》的取景地。原开滦矿务局大楼从立面设计、空间布局、内外装饰上独具匠心,宏伟又不失精妙,集中展现了开滦的雄厚实力,是近代工矿企业办公大楼的杰出典范。新中国成立后,为培养煤矿建设专业技术人才,燃料工

业部决定以焦作工学院为基础,在天津成立新中国第一所矿业高等学府——中国矿业学院。学院筹备处于1950年在开滦矿务局大楼成立,开学后大楼又成为办公、教学用房。虽然中国矿业学院1953年搬迁至北京,在津时间很短,但这座矿企建筑仍为许多校友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此后曾有数十年岁月,这座大楼为中共天津市委办公所用。

1950年,开滦矿务总局由天津迁往唐山,与矿区管理机构合并,天津改设办事处。1952年5月,燃料工业部接管开滦,成立开滦煤矿管理处。1953年5月,开滦天津办事处撤销。跨越三个世纪,被誉为“中国煤炭工业源头”的开滦,已逐步发展成为综合性大型能源集团,构建形成以煤炭、煤化工、现代服务和新兴产业为支撑的“三柱一新”产业发展格局,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超千亿元。回首过往,开滦凝结着中国人自强不息的初衷与使命,承载着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艰辛探索。如今它历久弥新,青春依旧,在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中,不断焕发出新的风采。

(本专栏图片由《小楼春秋》摄制组提供)

《小楼春秋》解说词：

希腊的古典建筑,它最伟大的一个发明就是柱式的发明。多立克柱式,体现出一种男性美。爱奥尼克柱式,就体现了一种女性美,那么看这14根柱子,应该都是标准的爱奥尼克柱式,体现了这种希腊对于人体美和数字美的建筑美学法则,所以我们应该说这是天津不可多得的一种瑰宝。

走进楼内,中部天井大贯通三层楼的高度,厅内铺着彩色马赛克地砖,房间里有木制的壁柱、地板。作为洋务运动和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见证者,开滦矿务局的开端,是1878年清政府创办的开平矿务局,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企业性质的工矿企业。(节选)



扫二维码,观看本期节目视频。